

研究启蒙理论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双重视角

第四届启蒙运动思想研讨会在京举行

张春海

2012-12-28 11:04:33 来源: 2012年12月26日《中国社会科学报》

【核心提示】12月22日,由浙江大学出版社主办的第四届启蒙运动思想研讨会在京举行。本报记者就相关话题采访了多位学者,他们认为,启蒙具有多元价值,思想启蒙对中国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学者要立足当代中国实际,加强对启蒙理论的研究。

启蒙运动所提倡的科学、理性推动了人类历史的进程,但由其间接引发的物欲膨胀、生态危机等效应,又使启蒙运动成为20世纪以来思想家反思的重点对象之一。12月22日,由浙江大学出版社主办的第四届启蒙运动思想研讨会在京举行。

本报记者就相关话题采访了多位学者,他们认为,启蒙具有多元价值,思想启蒙对中国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学者要立足当代中国实际,加强对启蒙理论的研究。

启蒙是人类自身认识的不断进步

浙江大学副校长罗卫东认为,如将启蒙理解为人类自身认识的不断进步,以及人类精神的不断成长和发育,则启蒙可被视为贯穿人类历史的主题。在此意义上,整个人类的精神史其实都是启蒙史,而肇始于欧洲的那场被称为“启蒙运动”的历史活动似乎只是人类启蒙史的一个特殊阶段。启蒙运动最大的历史产物,是奠定了理性和科学在人类精神活动和社会事务中的主导作用。

罗卫东还表示,关于苏格兰启蒙运动的研究不仅有益于认识苏格兰人的思想,而且对反思法国启蒙运动也有价值。

哲学需要承担去除蒙蔽的重担。湖北大学哲学学院院长戴茂堂提出,讨论启蒙必须面对蒙蔽和去蔽这两个互相关联的问题。人的有限性是人陷于蒙蔽的基本原因,为了避免这种自我遮蔽,人必须外化自身,但在外化过程中,要注意防止异化的产生。因为去蔽是一项全人类的事业,在此意义上,启蒙不仅具有永久性,而且应具有全球性。

“在某种意义上,启蒙是一种理性精神的气质或反思态度,可以被描述为对历史时代的永恒批判。”合肥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王志红认为,从启蒙主体意义上说,启蒙是一种理性生活方式,是为促进人类现代文明进步与社会现代化而作出的一种努力。

马克思主义开启与推进了中国现代性启蒙

近现代以来,中国现代性启蒙经过了艰难曲折的历程。与会者表示,马克思主义是开启与推进中国现代性启蒙的思想理论。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俞吾金认为,马克思与启蒙的关系具有两重性:一方面,马克思深受启蒙运动及其相应的观念的影

响。他关于理性、个性、自由、解放的许多叙述都切合启蒙运动的精神。另一方面，马克思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总是竭力掩盖剩余价值的起源，并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阐释为永恒的与合理的。同样，恩格斯也表示：“总之，同启蒙学者的华美诺言比起来，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当代中国人看待启蒙，也应具备这种双重的视角。只有这样，才能科学、全面、深刻地理解西方的启蒙，避免用纯粹西方式的理念、价值来“启”所谓中国之“蒙”。

中国现代性启蒙发生于特定的环境，在此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发挥了理论引导作用。王志红提出，西方启蒙运动是内源性启蒙，即是由生产力演进发展而推动生产方式和思想变革的内生型现代化所致；中国现代性启蒙则是以19世纪末资本主义扩张和帝国主义殖民统治引起民族、国家冲突为背景，拥有古老文明的中华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落入“落后挨打”境地。于是，“落后就要挨打”成为中国现代性启蒙的特定历史语境。

王志红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开启中国现代性启蒙的思想理论在中国现代性形成中扮演着独特的角色，具有独特作用。

科学认识和理性反思西方的启蒙

当前，现代性意义上的思想文化启蒙在中国并未完成，而低俗文化流行、现代迷信泛滥、伪科学沉渣泛起等构成了当代启蒙的困境。

对当代中国学者而言，仍然需要积极推进新启蒙运动的开展，反对迷信和愚昧，启发民智和提高素质。但同时也应借鉴当代西方学者对启蒙反思的成果，这就需要对启蒙蕴含的消极元素有所警惕，并对启蒙精神进行必要的修正。俞吾金认为，在此意义上，当代中国社会需要的新启蒙应该是“一种被修正的启蒙”。

面对新的环境，我们必须采取新的启蒙姿态。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张光芒称，这种“新”应该体现于三个方面：一是对中国的启蒙历史重新进行反思，厘清其中的问题和经验，对历史的解释要有新的眼光、标准和方法。二是对西方的启蒙重新进行反思。西方的后现代、后启蒙对西方启蒙的批判不能成为效法的对象，我们必须从中国启蒙的内在需求出发，重新发掘西方启蒙对我们的启示。三是要在此基础上探讨和建立属于中国21世纪的启蒙理论。

责任编辑：李秀伟